2020-05-06 아주대 중국정책연구소 Bunker ｜ 중국 싱크탱크 및 학계 ｜ 서민혜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중국현대국제관계연구원(CICIR)

**现代院专家谈“疫情下的全球化”**

**중국현대국제관계연구원 전문가 대담 “코로나시대의 세계화”**

来源：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20-04/28/content\_41137643.html

作者:  傅梦孜,冯仲平,胡继平 等  |   时间:  2020-04-17

【编者按】全球疫情次第爆发，欧美成重灾区，直击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价值链的中枢、信息链的源头，暴露全球化的脆弱性，折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非传统安全上的短板和不足。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召开“疫情下的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多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1. 更新全球化 （傅梦孜，副院长）**

 此次疫情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世纪性的，对全球化的冲击也是重大阶段性的。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曾一路高歌猛进，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等为特征，但经历过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出现明显回缩，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上升。此次疫情对全球化冲击更大，可能引起全球化的重大转折。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变轨的一次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变化，除信息流以外，我们所体会到的传统的全球化已然停顿。

  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史观的视角看，由隔绝走向联系、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虽偶有个例，如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也可以算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全球化进入“更新时代”，未来全球化面临重大调整。传统全球化主要内容是资本、劳动、货物、资源等的全球合理配置。但疫情切断这些配置过程，因此全球化需要“更新”。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和治理能力的效率得到凸显和广泛认可，可在全球化更新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传统霸权国引力下降，为更新全球化创造全新氛围。短期内人员流动受限，但同时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提供空间。目前复工复产企业集中于制造业领域，为未来全球化向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疫情使国际社会更开诚布公地共同应对挑战，可能成为更新全球化的一个切入口。

  中国在引领全球化及世界发展方面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合作与更新全球化相适应，与在推进过程中的各项区域治理安排相结合，可成为中国引领更新全球化的渠道。要实现引领，首先要更好地兼顾内外协调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要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疫情暴露资源全球配置的脆弱性，中国经济规模应足以支撑最基本的资源配置需要，应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尽量避免国际突发事件导致产业链、价值链断裂。此外，推进新技术应用，推动高质量的全球化，占领全球化更新的经济先机。

**2. 疫情推动改变经济全球化 （冯仲平，副院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以及全球治理等均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更加直接、更为明显。随着欧洲和美国成为“震中”，疫情已波及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英国《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以“地球打烊了”为标题，生动形象地描述出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欧洲起初对疫情并不重视，一些人甚至认为欧洲的医疗水平、国家制度不同于中国，不会受到影响。随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的形势日趋严重，欧洲人才醒悟到病毒不分民族、国界、意识形态。三月中旬以来，欧洲各国的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加码。

  疫情爆发之前，世界已开始反思全球化，欧洲不少人普遍认为，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发展过快，甚至“走过了头”。国家权力似乎失去了对跨国资本的控制，造成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拉大，本土文化遭受冲击。此次疫情不仅不会颠覆人们的既有认知，反而会进一步强化。欧洲国家担心全球产业链布局过于脆弱，法国在疫情中“突然发现”本国的防护设备和医疗器械主要依赖外国厂商，一旦进口受阻或停止供货，将面临巨大安全风险。

  疫情进一步推动深刻改变全球化发展的轨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表现出三大特性，即平衡性、保护性和区域性。具体而言，各国将更注重把握自身发展和外部依赖的平衡，“保护主义”色彩将更为突出，东亚、欧洲和美国三大区块化发展或将更加明显。“经济民族主义”在未来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会更突出。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竞争也会给新的全球化打上深刻烙印。中美之间军事、技术领域事实上已“脱钩”，经济上虽难以“脱钩”，但政治的干预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在2019年“进博会”上，习主席提出“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共享”的口号，展示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总之，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势会深刻影响未来全球化发展的面貌。

**3. 疫情改变全球化发展节奏 （胡继平， 副院长）**

  思考疫情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要看它给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全球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企业和政府两个方面，一般企业在台前，政府在幕后。企业和政府推动全球化的出发点，无非是两个，发展和生存。从企业来说，全球化可使它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这也是企业在全球化初期的主要目的。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竞争激化，提高竞争力日益成为企业推动全球化的重要目的。而且，全球化程度低的企业因为竞争力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于是企业不得不竞相提高全球化水平。企业这种“发财”“保命”动机，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企业通过全球化获得更高利润和竞争力，会使政府得到更多财政收入，国家实力和竞争力也得到提升，因此政府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全球化阻力主要来自其本身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一方面，它会带来效益与公平的矛盾。全球化让企业、股东获利，但同时也在国内出现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这一矛盾企业可以不考虑，但政府却必须考虑。政府的调节往往会滞后，其总的目标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国内平衡必须考虑，但追求公平会减少企业利益，如果过度会使本国企业因为竞争力下降而被国际市场淘汰。

  另一方面，全球化会带来效率与安全的矛盾。全球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使社会分工更细、生产链更长，面临被自然灾害、疫情、战争、贸易战等切断的风险，因而使国家经济、企业生产链的安全性更加脆弱。企业和政府都要考虑这一矛盾。

  疫情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几乎没有影响，因为企业逐利的本性、保持竞争力的动机没有也不会改变，因此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但疫情已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严重冲击，它让政府和企业在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方面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反思、关注和资源投入，在效率和安全二者之间重新取得平衡。比如，有些国家可能会将自认为关键的产业留在国内。

  全球化的阻力之前主要来自效益与公平的矛盾，欧美的反全球化运动大部分与此有关，但疫情会使效率与安全的矛盾更为突出。在全球化整体趋势不会逆转的前提下，疫情过后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链仍会得到重建，但全球化的推进速度、发展节奏应该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全球化不可能一往无前，必须在发展过程中消化、解决所带来的问题。

 **4.** **经济全球化的清算与出清 （张运成，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疫情使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资本、贸易基本“断流”，只剩信息还在流动，但其中有关疫情蔓延、死亡等信息的传播，加剧公众恐惧和保护，对未来全球化的接受度造成二次伤害，势将带来较长时间的负面影响。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出现于疫情之前，其概念却因疫情而更清晰。“反全球化”的主体是民众。他们未受益于全球化，反而遭遇失业、贫困等损失，成为所谓“全球化的输家”。“逆全球化”的主体是政府，如美国政府强化保护主义、发动贸易战，另有国家逼迫企业缩短供应链、回归国内。“去全球化”则是不可抗力因素使然，如新冠疫情这类突发重大公共卫生灾难，主要影响个人，受迫为之。疫情下，锁国政策“锁”住了个人，也“锁”住了世界。全球化挫折莫此为甚！

  疫情是对全球化困境的一次短暂“出清”，虽对全球化冲击巨大、深远，但仍是暂时、可逆的；而全球保护主义升温、中美贸易战不止才是趋势性、结构性的，是决定全球化走势的最大变量。

  疫情过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重点和节奏会有较大调整。“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将更突出“安全”和“可持续”要素，经济利益更将让位于经济安全考虑。

  疫情考验各国的全球治理取态和自身治理能力。有的国家看到加强国际合作抗疫促经的必要性，有的国家却看到“脱钩”的紧迫性。中国并非关起门来才能做好自己的事，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反而应实际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各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危机，力所能及地向各国提供防疫、抗疫物资等“全球公共产品”，展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抗疫情、促经济的经验和优势，避免他国因疏忽、轻视而重蹈付出巨大牺牲的覆辙，积极为疫情后世界的重联重建建言献策。由此来看，中国籍此构建并提升的自身能力建设，实际上也是世界和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所需。这种体现出中国方案的“软实力”是另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定会是全球化的推动力，并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接受检验和考验。

**5.** **疫情对全球化主体的影响 （江 涌，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人们对于全球化内涵的认知不尽相同，经济的一个视角将全球化概括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四大流动。自由主义者关注“物”，新自由主义者关注“资金”，历史唯物主义者则关注于“人”。疫情下，各国关闭边境，封锁城市，关住的是“人”；“物流”“资金流”等受阻的背后，是“人”的就业的流失，是收入与福利的削弱。

  疫情对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表现在个体、国家、企业等三个层面。

  从个体层面看，此次疫情最可怕之处在于不仅传染性强，而且致死率高，直接对人的生命造成重大威胁，直击人性中最脆弱之处。人们的关注由个体发展的自由平等，更多地转向生命、健康、纪律，社会思潮呈现由自由主义向集体主义倾斜趋势。

  从国家层面看，疫情无法掩盖，使得各国政府直面治理能力“大考”。同时，民众期盼政府积极作为、果断行动，促使国家权力迅速扩张、更趋强化。这显然偏离了全球化原本要求削弱权力中心、国家不断让渡主权的既有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的扩张具有惯性，即使疫情过后仍会持续较长时间，“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各国将普遍面临如何收缩已扩张、已强化的国家权力。此外，疫情还使国家间的不信任程度加深。不仅西方频频向中国“甩锅”，欧盟成员国之间、美欧之间的矛盾和裂痕也被暴露和放大。

  从企业层面看，疫情使得跨国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变，民族资本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必将上升。口罩、试剂盒等昔日普通商品而一跃成为战略物资，使得相关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或将迎来“国产化”浪潮。企业生产模式亦将发生改变，由利润优先向重视安全转变。全球产业链下的长距离运输或向本地生产回调，“零库存”的经营模式也将向更加重视物资储备方向倾斜。

  经济史学认为，全球化不是线性发展的趋势，而是具有周期性的。疫情中的全球化呈现明显的回调趋势（特别是人流），是对全球化周期性发展的有力印证。疫情导致全球化进程被“暂停”，可以认为旧的一轮全球化周期正在结束，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或将迎来重启后的新一轮全球化，后者必将具有与前一轮周期不同的新特色。人类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不是勇往直前的，全球化进程亦会有回头，会遇波折。

**6.** **疫情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影响 （姚 琨 ，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疫情按下全球化“暂停键”。受疫情冲击，全球股市严重动荡，美股市十天内四次熔断，油价暴跌至20多美元，世界经济衰退风险迫近。加之大国经贸博弈愈演愈烈，世界贸易大幅下挫，主要经济体深陷结构性改革困境，全球化遭遇空前挑战。有分析指出，新冠疫情可能持续一到两年，甚至与人类长期共生。类似判断将重挫市场信心，并使疫情影响从公共卫生领域向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延宕，从而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

  疫情或催生新的国际秩序。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民粹主义与极端思潮泛滥，其影响和趋势将被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放大。从国际层面看，疫情将进一步加剧“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从国内政治看，民族国家意识可能强势回归，国家趁势“收复”以往被超国家联盟、NGO、跨国企业等行为体侵蚀和削弱的国家主权。疫情暴露部分西方国家应对乏力的窘境，也显示出中国等新兴大国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各国之间发展模式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美式价值观吸引力下降，世界将加速进入多元思潮并存与融合的时代。

  全球治理动能缺失，“治理真空”愈发凸显。年初以来，蝗灾、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议题此起彼伏，“天灾”“人祸”叠加，国际救援供不应求。尤其疫情使各国普遍“内顾”，利已主义、民粹主义盛行，降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和投入度。大乱呼唤大治，国际社会亟待主要大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也考验主要大国协调合作、共克时艰的政治智慧。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 중국국제문제연구원(CIIS)

**在全球抗疫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글로벌 방역으로 인류 운명 공동체 이념 실천**

来源：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20-04/28/content\_41137643.html

作者：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 时间：2020-04-28

原文载《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20年第2期

**一、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自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经历了从局部发生到多地多发再到全球蔓延的变化。自2020年1月疫情发生以来，尽管中国率先采取了在武汉实施“封城”、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卫生一级响应等重大举措，举全国之力全面抗击疫情，但由于各国对病毒和疫情发展的认识不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机制和效率不同，以及相关资源的生产和储备能力不同，疫情仍呈现出全球多地区多发性的蔓延态势，目前全球除南极洲以外各大洲都已出现确诊病例，并在东亚、西亚、欧洲和北美洲等地形成新的爆发点。到3月11日全球已有115个国家被卷入疫情，确诊病例上升到115119例，死亡4387人。疫情在短期内已难以被遏制并将持续传播，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全球性大流行”的特征。新冠肺炎成为人类社会自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传播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抗疫也已进入最为关键的时期。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态势，印证了习主席代表党和政府对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精准判断。经过近三十多年来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各地区在增进了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密切了人员往来。人际关系的多元化、国际化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普及和便利，全球化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便捷通道，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蔓延更为快速、分散，难以追踪溯源、围追堵截，各国抗击疫情的内外环境更为复杂，对于全球防控、阻断和遏止疫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疫情发生有先后但病毒不分国界、无论族群。在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新冠病毒挑战的同时，一些无端指责甚至幸灾乐祸的言论、少数具有地域偏见和种族歧视的行为表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先需要在观念上克服狭隘和偏见，真切意识到人类社会在文明交汇、互通有无的动力驱使下相互交往、利益共享，也必须在灾变突起、难以独善其身的危机面前同气连枝、共担责任。“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疫情的全球传播正是人类社会命运共同的真实写照，全球抗疫的积极行动也将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坚实一步。

**二、全球抗疫要践行“义在利先”的国际人道主义**

在全球抗疫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各国明确职责并付诸行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验，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合作意愿、能力和效率的大考验。国际社会只有各尽其责并通力合作才能经受住这场大考验。

**首先要破除独善其身、以邻为壑的狭隘观念，在全球抗疫中践行“义利平衡、义在利先”的义利观，让同病相怜、同舟共济的国际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方向。**习近平主席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暴露问题和短板的危机，也是一次迎难而上、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大考。在疫情发生之初，中国在全面防控疫情的同时，就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秉持“越是在危难时刻，越是要守望相助，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要密切合作”的信念，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日、韩等近邻和其他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民众通过物资捐赠和精神鼓励为中国抗疫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截止目前，已有近70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捐赠了口罩、防护服等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发电发函，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对于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心怀感激，并在疫情出现国际蔓延之后投桃报李：得知日方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中方紧急捐赠一批检测试剂盒；韩国疫情形势严峻，中方紧急筹备大量医用口罩给予支援；在伊朗、巴基斯坦和部分非洲国家疫情发生后，中方紧急捐赠核酸检测试剂盒及医疗设备，并派出中国专家组驰援疫情危机中的意大利；还向世卫组织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在共同挑战面前，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正通过这样的相互同情、馈赠和支援不断得到体现和强化，不断战胜狭隘自私的偏见和歧视，成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观念和思想基础。

**其次要在中国率先缓解疫情但全球疫情仍此起彼伏、胶着难下的关键时期，通过信息沟通、经验分享和物资支援来体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前，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时还存在信息不够畅通、资源不够充分和合作不够充分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出当前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状况，各国在经济实力和资源、科研能力和水平、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应急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充分和分配不平衡问题。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在防控大规模传染性疫情的传播上，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具有作出快速反应、进行有效防御的能力，因此整个世界并没有做好应对大规模疫情传播的准备。各国体制机制不同、资源能力有异，面对的疫情发生方式和变化阶段也不同，因此在应对疫情挑战之初，必须因地制宜、守土有责并且要各尽其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国不乏成功的经验也有失利的教训。随着疫情进入“国际大流行”阶段，各国在力尽守土职责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医疗科研合作、抗疫经验分享和应急物资支援。中国国内正进入疫情阻击战的最后关键阶段，其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正遭受疫情肆掠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而且中国也从不吝啬分享和回报。中方最早测定病毒基因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检测试剂盒、研究确定诊治方案，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和全世界科研机构分享。在世卫组织代表团结束在中国考察后，第一时间与中方联合发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这是中国与世卫组织积极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向世界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验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函60多个国家的110位政党领导人，在感谢各方提供支持帮助的同时，重点介绍了中方的抗疫做法和经验。中国民航将发布的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提供给韩国、日本等相关国家，并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合作，推动国际民航组织完善全球民航共同应对疫情的国际标准和指导材料。这些中国主动承担的国际合作义务，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在国际社会收到了良好效果，将使得命运共同的观念深入人心、生根开花并带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最后，要在总结新冠疫情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为在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在全球抗疫中通力合作绝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不断同病毒和瘟疫作斗争的历史。在全球化推动下已经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可持续和有效率的公共卫生机制来祛除疾患、维护健康。近年来，在抗击非典、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些双边、局部的有效合作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经验，但距离全球性、可持续和更紧密合作还有差距。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范围传播在暴露出现有国际合作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找差距、补短板、增效能的紧迫问题。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危机重现，中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从当前的国际合作中总结经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找到在公共卫生领域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可行方向和路径。

**三、全球抗疫不竟全功绝不轻言胜利**

全球抗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遏制住疫情发展这么简单。随着各国对抗疫投入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了防止疫情去而复来并减少次生灾害，如何维护全球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也是全球抗疫合作的重要内容。

全球抗疫不可避免地打乱了既定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议程，可能引发或放大一些国际冲突，大范围的停工停业也加剧了经济发展的困境，民众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也会放大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好，由疫情引发的其他危机和损失有可能导致全球抗疫前功尽弃。

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必要保持经济合作、维护经济秩序，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基础上，既要积极扩大防疫相关产业的投入，不断缓解医疗物资短缺造成的全球抗疫困境，又要形成“边抗疫边生产”的局面，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正常运转。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中国要在加大复工复产力度的基础上，瞄准供应链的需求，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不仅为自身经济的疫后发展打好基础，还要为维护全球经济安全作出贡献，不仅能降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减少疫情对民生的负面影响，还能有力回击借疫情想搞经济“脱钩”的某些国家和人士，维护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还有必要在同病相怜、与子同袍的基础上发展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情感共同体”。全球抗疫既是以各国政府为基础的共同责任担当，更是超越国家民族边界、以人类文明为根基的共同心路历程。在共同抗疫的过程中，中外民众之间相互同情、相互慰藉的场景比比皆是，增强了全球抗疫的信心和力量。只有坚持“求生亦容人求生、待人如望人待己”的人类良知和国际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具有强大的社会和民间基础，才能拥有在灾难面前温暖人心、相互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环球时报 - 환구시보

**疫后全球治理创新需加强多边合作**

**코로나 이후 국제 거버넌스 혁신으로 다자간 협력 강화하자**

来源：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3y58HpQ5IKS

作者：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 时间：2020-05-03 ｜ 原文载《北京青年报》

4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线上会议，《地球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长江商学院创世院长项兵和笔者等中外学者围绕“疫情下的全球化”展开对话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如一面镜子，映射出现存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这一点首先表现为联合国体系在应对全球疫情中作用有限。作为二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心治理机制，联合国是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在历史上多次国际危机的应对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联合国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有所下降，机构臃肿和会员国之间利益冲突等因素，逐渐使联合国有些“力不从心”。

疫情对国际自由贸易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一些国家为了优先保护本国民众而限制医疗物资、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出口，全球贸易受疫情影响可能会出现大幅下降，但当疫情过后，贸易仍然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也意味着，各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恢复和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

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显露出的脆弱性也引起了各国关注。全球化发展至今，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已经将各国紧紧连接在一起，疫情引发了各国对自身产业布局的风险和成本两者之间平衡点的新思考。虽然“全球脱钩”这种倒退式发展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但区域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将成为疫情过后“三链”重组、产业转移重新布局的趋势。

疫情让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凸显。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性危机，在暴露全球治理体系不足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全球治理创新提供了契机。疫情过后，面对各种尚未解决的挑战，各国更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创新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通过制度改革推动世界经济恢复。

在政府层面，各国可通过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合作机制，合力推动疫后经济恢复。日前，G20举行贸易投资工作组应对新冠疫情特别视频会议，对此前G20领导人特别峰会通过的联合声明进行深入讨论。G20具有的多边合作精神和对各国的协调能力，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从疫情阴霾中走出。建议随着疫情发展及其变化，G20领导人峰会可在关键节点多次召开，把握引导全球抗疫和恢复世界经济的工作方向。G20卫生部长会议、贸易部长会议、农业部长会议等专门会议也应适时召开，以落实G20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共识。

各国应继续推动联合国体系改革，特别是在出现全球危机之时，应加强联合国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日前，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首次召开视频会议探讨共同抗疫，发出了多边合作遏制全球疫情的积极信号。联合国还可每年固定召开卫生部长大会、贸易投资部长大会等专门会议，加强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推动疫后世界经济恢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作出更优预案。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度、秘书处透明机制、发展筹资机制等都亟须改革创新，这些也是联合国改革未来面临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合作对全球抗疫和发展经济至关重要。约瑟夫·奈在博鳌亚洲论坛线上对话中提出，中美两国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一波大规模疫情蔓延。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中可以获得更多合作动力，这种动力在疫情过后应继续保持。欧洲也应扮演重要角色，形成中美欧三方合力，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体系。

在社会层面，各种研究机构、智库等民间力量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新讨论，发挥民间外交凝聚多边力量、完善双边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智囊团，应积极开展“二轨”交流，搭建沟通的桥梁，凝聚国际共识。中国智库应积极走向国际舞台，在有关全球治理创新的讨论中发声，协助政府在推动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个人层面，尽管个人特别是普通人力量有限，能发挥的作用或许也是微弱的，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不需要作出努力。新冠疫情让每个人都看到，我们不仅是自己国家的公民，也是“全球公民”，不但要履行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也要尽到作为“全球公民”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要顺应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大势，力所能及实现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并以公民之力参与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危机，既是灾难也是警醒。面对挑战，逃避责任和指责推诿都不能解决问题，“脱钩”等倒退式发展更无法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各国需要展现积极的多边合作精神，协调行动并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